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郭 晗, 任保平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 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 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 U 型曲线的一般规律, 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 中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 在 2010 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 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 并将在 2030 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关键词: 人口结构; 人口红利; 人口负债; 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892 (2014) 03-0005-09
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14.03.001

一、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经历了连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被称为“中国增长奇迹”。与此相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结构转变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从 1982 年到 2010 年, 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 61.5% 上升至 73%, 总抚养比从 62.6% 下降至 34.2%。基于此, 在对“增长奇迹”的解释中, 有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 并提供了经验论证 (David 和 Williamson, 1998; 王德文等, 2004; 蔡昉, 2008; Choudhry 和 Elhorst, 2010)。^[1-4]也有一些学者阐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一是资本供给方面的储蓄率变动机制, 即社会抚养比降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 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王丰, 2006; 汪伟, 2009; 朱超等, 2012)。^[5-7]二是劳动供给方面的劳动力转移机制, 即适龄人口比重增加, 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 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供给, 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 从而维持了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王德文, 2007; 蔡昉, 2010)。^[8-9]

在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 也有学者对人口红利效应进行了反思, 提出人口红利的有限性 (王丰, 2007; 蔡昉, 2011)。^[10-11]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 那么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意味着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面临着重要的瓶颈。为了应对这种状况, 应当加快中国经济增长

收稿日期: 2013-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 (13JBG0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0YJC790418); 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资助项目 (YZZ12043)

作者简介: 郭 晗, 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联系方式 nashil@126.com; 任保平, 西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转变(蔡昉, 2013)。^[12]由此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即中国的人口红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人口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试图从人口结构转变和增长核算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人口转变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维度来分析人口红利变化的一般规律;第三部分采用一个增长核算的框架,从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四个角度具体分析中国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人口红利减少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的转型路径。

二、人口红利变化:理论与经验

(一) 人口红利变化的一般规律

人口红利变化的实质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本文将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三阶段进一步拓展,将人口转变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高且存在波动;第二阶段,由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开始下降,而出生率基本保持不变;第三阶段,出生率开始明显下降,死亡率保持缓慢下降趋势;第四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处在较低水平。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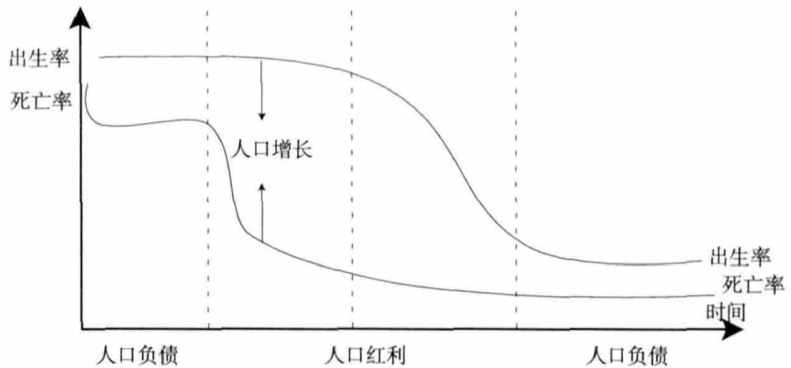


图1 出生率、死亡率与人口转变的阶段

根据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以推断出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红利(负债)的变化。在第一阶段,较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使得整个社会中少年人口较多,少儿

抚养比较高,从而形成少儿人口负债,即负的人口红利;到第二阶段,由于死亡率首先开始下降,预期寿命增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增加,形成人口红利;第三阶段,出生率迅速下降,少年人口比重开始减少,死亡率下降速度减缓,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大,形成人口红利;当到达第四阶段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老年抚养比较高,从而形成老年人口负债,再次出现负的人口红利。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人口红利期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这对经济增长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二是较低的社会抚养比能够提高储蓄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但在“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的转变过程中,人口红利本身也体现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人口红利是一个定量概念,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非离散变量,而是连续变量。人口红利与社会抚养比呈反方向变化,人口红利大时,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比较低。由于人口红利与社会抚养比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我们将人口红利用 $1/(r_a+1)$ 来表示,其中 r_a 为社会总抚养比,它等于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那么人口红利的变化应当呈现出如图2所示的规律。

如图2所示,横轴为时间,纵轴为人口红利 $1/(r_a+1)$,横轴所在的人口结构为标准人口结构,即这样的抚养比表示既无红利也无负债。在一个封闭的时间段 OF 内,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总抚

养比将呈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而人口红利 $1/(r_a+1)$ 则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历经“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的转变。从形态上来说，人口红利的变化表现为一条倒 U 型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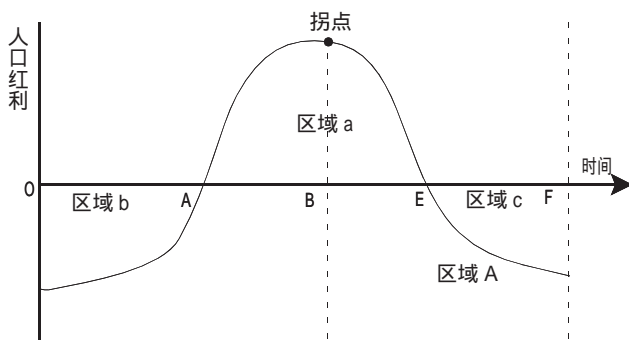


图 2 人口红利的变化区间

在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期内，A、B、E 三个关键转折点将 OF 划分为四个时间段：OA 体现为人口负债，并且人口负债逐渐消失，向人口红利转化，A 点为人口负债向人口红利的转折点；

AE 为人口红利期，其中 AB 为人口红利逐渐增加的过程，BE 为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直至消失的过程，B 点为人口红利拐点；EF 为第二个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再次形成，E 点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折点。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特性，区域 a 的面积相当于区域 b 与区域 c 面积之和。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非是一种“馈赠”，在红利期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多少好处，在负债期就要付出多少代价。

(二) 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

在对人口红利变化的一般规律做出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进行测度并验证这一规律。现有文献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方法多采用抚养比指标的分解（王丰，2006；陈友华，2005）。^[5, 13] 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它只能表现人口红利变化的相对程度，较难展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人口红利本意是指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因此，可将经济增长的贡献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正常增长”，即既无人口红利也无人口负债的增长，或者说在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增长；二是“红利增长”，即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

将人均产出 (y) 分解为劳均产出 (Y/L) 与抚养比因子 (P/L) 倒数之积，其中 Y 为总产出， P 为总人口， L 为劳动年龄人口，则有以下等式：

$$y = \frac{Y}{P} = \frac{Y}{L} \cdot \frac{L}{P} = \frac{Y}{L} \cdot \left(\frac{P}{L}\right)^{-1} = \frac{Y}{L} \cdot \left(1 + \frac{P-L}{L}\right)^{-1} = \frac{Y}{L} (1+r_a)^{-1} \tag{1}$$

同理可得“正常产出”部分，即标准人口结构下的人均产出水平：

$$y' = \frac{Y}{L} (1+\bar{r}_a)^{-1} \tag{2}$$

其中， \bar{r}_a 为标准的抚养比。因此，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用如下等式衡量：

$$divi = \frac{y-y'}{y} = \frac{(Y/L) \left[(1+r_a)^{-1} - (1+\bar{r}_a)^{-1} \right]}{(Y/L)(1+r_a)^{-1}} = 1 - \frac{1+r_a}{1+\bar{r}_a} \tag{3}$$

由 (3) 式可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divi$ 只与抚养比相关。我们以瑞典 1957 年的社会抚养比 53% 为标准人口结构，计算出我国人口红利对增长的贡献。之所以选取该数值为标准值是因为：第一，瑞典的生命统计质量很高，是世界上生命统计质量最高的国家；第二，瑞典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因此，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三，瑞典 1957 年人口预期寿命为 72.5 岁，与中国目前的预期寿命水平非常接近。测算结果见表 1。另外，根据联合国发展报告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我们再进一步计算出 2015-2050 年的人口红利贡献率。计算结果见表 2。

表1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53-2012

年份	人均产出 (元)	正常产出 (元)	红利产出 (元)	人口红利贡献率
1953	141.76	154.48	-12.72	-0.0897
1964	208.42	242.05	-33.63	-0.1614
1982	527.78	556.54	-28.76	-0.0545
1987	1112.38	1094.87	17.51	0.0157
1990	1644.47	1598.99	45.48	0.0277
1995	5045.73	4881.78	163.95	0.0325
1996	5845.89	5656.32	189.57	0.0324
1997	6420.18	6185.49	234.69	0.0366
1998	6796.03	6540.93	255.10	0.0375
1999	7158.50	6882.86	275.64	0.0385
2000	7857.68	7293.46	564.22	0.0718
2001	8621.71	7976.69	645.02	0.0748
2002	9398.05	8709.53	688.52	0.0733
2003	10541.97	9757.85	784.12	0.0744
2004	12335.58	11335.55	1000.03	0.0811
2005	14143.70	12832.05	1311.647	0.0927
2006	16456.27	14871.67	1584.605	0.0963
2007	20117.48	18128.64	1988.841	0.0989
2008	23647.64	21230.70	2416.939	0.1022
2009	25545.36	22856.29	2689.065	0.1053
2010	29920.13	26238.62	3681.514	0.1230
2011	35097.12	30832.38	4264.742	0.1215
2012	38325.46	33781.64	4543.819	0.1186

数据来源：1999-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2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测值：2015-2050

年份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	人口红利贡献率
2015	40	27	13	0.0850
2020	44	27	17	0.0588
2025	46	26	19	0.0458
2030	49	25	24	0.0261
2035	54	24	30	-0.0065
2040	59	24	35	-0.0392
2045	61	24	36	-0.0523
2050	63	25	38	-0.0654

抚养比数据来源：联合国网站。

据表 1 和表 2 可知,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情况基本与人口红利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吻合的,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 2010 年,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折点约出现在 2030 年。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10 年达到顶峰,此后持续下降,并将在 2030 年转向人口负债。根据抚养比的变化情况,我们又发现,人口红利的降低和消失主要是由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造成的。这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中国逐渐步入老年人口负债期。因此,为了应对老年人口负债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在人口红利降低背景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推动新红利空间的形成。

三、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要素的增长,即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二是技术和效率的增长。那么,人口红利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我们采取一个调整后的 Solow 增长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后,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可得:

$$Y = AK^\alpha H^\beta L^{1-\alpha-\beta} \quad (4)$$

其中, Y 表示总产出, 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K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H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 L 表示劳动力投入, α 、 β 和 $1-\alpha-\beta$ 表示各种要素份额。给等式两边同除以总人口 P 并取对数,可得:

$$\ln y = \ln A + \alpha \ln k + \beta \ln h + (1-\alpha-\beta) \ln \left(\frac{L}{P} \right) \quad (5)$$

其中, y 为人均产出, k 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h 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可将等式改写为:

$$\dot{y}/y = \dot{A}/A + \alpha \dot{k}/k + \beta \dot{h}/h + (1-\alpha-\beta) \left(\frac{\dot{L}}{L} \right) / \left(\frac{L}{P} \right) \quad (6)$$

由 (6) 式可知,人均产出增长率 \dot{y}/y 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dot{A}/A 、人均物质资本的变动 \dot{k}/k 、人均人力资本的变动 \dot{h}/h 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动 $\left(\frac{\dot{L}}{L} \right) / \left(\frac{L}{P} \right)$ 四部分决定。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形成分别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 人口红利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变化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最为直接。从静态角度看,在人口红利期内,宏观上,劳动力供给直接扩大;微观上,由于抚养比降低,家庭中会有更多的劳动人口进入生产性活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负债期内,劳动力供给减少,同时高抚养比也会使更多适龄劳动人口参与到非生产性领域中,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当人口红利变化时,劳动力供给也会发生变化。

人口红利增加,意味着 $\left(\frac{\dot{L}}{L} \right) / \left(\frac{L}{P} \right)$ 扩大,从而经济增长率 \dot{y}/y 提高。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也可以解释这个机理。 $\left(\frac{L}{P} \right)$ 可改写为 $\left(1 + \frac{P-L}{L} \right)^{-1}$, 也即 $(1+r_a)^{-1}$, 那么 $\left(\frac{\dot{L}}{L} \right) / \left(\frac{L}{P} \right)$ 可以表示为 $\left(\frac{\dot{r}_a}{1+r_a} \right)^{-1}$, 该函数是社会抚养比 r_a 的减函数。这意味着如果社会抚养比降低,人口红利增加,那么劳动人口比重增长率提升,经济增长率提高。

因此,当人口结构处于第一个人口负债期时,劳动力供给低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劳动力数量,但处于不断上升状态;当跨越人口负债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后,劳动力供给高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劳动力数量,出现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额外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当到达人口红利拐点时,劳动力供给处

于最大时期,并在拐点之后出现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当跨越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折点后,劳动力供给将再次低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劳动力数量,劳动要素将变得稀缺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从我国现有情况来看,近三十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61.5%上升到73%,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但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速的降低,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要素逐渐变得稀缺,从而不能维持以往的增长贡献。近年来各地出现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就是人口红利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的表现。

(二) 人口红利变化与资本形成

人口红利变化与资本形成的关系来自于生命周期假说。在生命周期理论中,适龄劳动人口为“储蓄人口”,而非劳动年龄人口为“消费人口”。相应地,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红利期时,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也即社会抚养比或劳动力人均负担较低,这就为高储蓄率创造了条件。而一国处于人口负债期时,高抚养比使得整个社会难以形成较多的储蓄。这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可以提高储蓄率。

当人口红利增加时,社会抚养比降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及其增长率提高,从而储蓄率及其增长率增加,为资本形成创造条件,使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提升,从而经济增长率提高。因此,随着人口红利变化,储蓄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人口结构处于第一个人口负债期时,储蓄率低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储蓄率,但处于不断上升状态;当跨越人口负债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后,储蓄率高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储蓄率,出现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额外的资本形成”;当到达人口红利拐点时,储蓄率处于最高点,并在拐点之后出现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当跨越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折点后,储蓄率将再次低于标准人口结构下的储蓄率,资本要素将变得稀缺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近十几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中国取得“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而工业化的推进对于资本要素的要求很高。正是中国人口红利期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为中国的资本要素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统计,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的35.3%提升至2010年的48.6%,十年间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保持了年均约10%的高增长率。

(三) 人口红利变化与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红利变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并无直接关系,即人口红利变化并非人力资本积累变化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人口红利变化时,人力资本积累是否变化取决于个人主体和国家主体的选择。但人口红利变化是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变化的潜在因素,其机理有二:第一,由于人口红利期内社会总抚养比较低,储蓄率提升提供了更多的资本形成,而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扩大,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期内,仅依靠粗放的要素投入增长方式也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在人口负债期内原有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客观上迫使一国转变增长方式,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增长转向劳动力质量增长,从收获“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第二,当人口红利消失,到达第二个人口负债期时,人口变化体现为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此时的人口负债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负债。社会少儿抚养比较低,客观上促使家庭给每个子女以更多的教育投入,从而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实现资本报酬递增。

因此,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个人主体和国家主体的行为选择做出影响,引发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进而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当人口红利跨越由人口负债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时,在人口转变中主要体现为死亡率的下降,此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动主要体现为劳动力营养健康水平的上升;当跨越人口红利拐点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客观上使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通过教育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四) 人口红利变化与劳动力配置效率

人口红利变化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的效率提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常其收获人口红利的过程也伴随着其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过程。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恰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体现。人口红利增长将导致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由于二元结构转变初期工农业生产率存在差异,在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将提高效率,进而创造更高的产出增长率。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必须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变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劳动力配置效率也随之变化。当跨越人口负债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时,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流向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逐渐上升;当到达人口红利拐点时,无限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变为有限劳动力供给,工农业生产率差距缩小,劳动力配置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当到达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折点时,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配置效率达到最高水平。

综上,在人口红利期内,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对资本形成和劳动力供给的贡献。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来维持增长。

四、人口红利减少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人口红利减少背景下,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劳动力减少和资本报酬递减的约束,从而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的状况,甚至引发了学者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持续的争论(黄少安和孙涛,2013)。^[14]但有更多学者提出通过开发“新人口红利”或“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孟令国和王清,2013;蔡昉,2013;齐明珠,2013;贺大兴,2013)。^[15-18]新人口红利的形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量的层面,即通过户籍、社保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改革,进一步消除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的制度化障碍,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第二层次是在质的层面,即通过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使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突破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要素约束,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新人口红利形成机制实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是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短期增长走向长期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要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五个方面加快转型。

(一) 基本路径:从要素依赖到生产率提升

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前,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工业部门基本处于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不会面临资本报酬递减,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外生增长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由此形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对要素扩张的路径依赖(郭晗和任保平,2013)。^[19]但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从而资本要素投入将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状况。此时投资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变得不可持续,必须打破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对要素的路径依赖,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从依靠资源投入扩张转向依靠生产率的增加。因而未来人口红利的变化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注重投资扩张的外生增长向注重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转型。

(二) 劳动要素: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

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前,我们往往更加注重劳动力的数量增长,由于仅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增长

也不会面临资本报酬递减,因而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一旦人口结构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则在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将无法保持原有的增长速度,甚至出现劳动力负增长的局面,从而使得要素增长出现不均衡的状况。在劳动力面临资本深化的情况下,唯有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式,使劳动力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将传统发展过程中注重数量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发展新阶段中注重质量的新人口红利,即人力资本红利,才能解决要素增长不均衡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倒逼状态,从而加速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向劳动力的质量增长转型。

(三) 资源要素:从粗放开发到高效节约

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前,人口结构的相对年轻化导致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作用。人口结构年轻化虽然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负担较轻,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口的高生产性可能对生态环境消耗更大,持续的人口红利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即当代人消费了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特别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过高,生态环境的代价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体现出来,在人口红利背景下的粗放开发型增长尤其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必须在生态环境问题大规模凸显之前快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从资源粗放开发型增长向资源高效节约型增长转变。

(四) 政策调控: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前,由于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所带来的充裕资本,经济增长的发展不会面临要素瓶颈,此时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完成的。在过去供给约束不明显的情况下,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效果。而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面临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约束,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此时,实施供给管理就成为新阶段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任保平和郭晗,2013)。^[20]供给管理是在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和人口红利变化的条件下来进行的,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大都具有长期性。供给变化引起的生产成本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往往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并以效率改变为条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变化是通过长期供给因素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来实现的。因此,在人口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的政策重心必须由需求管理转变到供给管理,以突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要素约束,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五) 根本目标:从增加数量到提高质量

在人口红利拐点来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还是强调发展的数量,这是由要素扩张型的发展方式所决定的,而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低质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已经为这种数量式增长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并且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这种数量式增长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增长质量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保证。所以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应当关注经济结构、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成果分享,必须要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标,针对过去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David E. B.,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 (3): 1-24.
- [2]王德文,蔡 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

2004, (9): 2-11.

[3]蔡 昉. 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Choudhry M. T., Elhorst J. P..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J]. *Economic Systems*, 2010, 34 (3): 218-236.

[5]王 丰.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3): 2-18.

[6]汪 伟.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 *经济学 (季刊)*, 2009, (10): 29-52.

[7]朱 超, 周 晔, 张林杰. 储蓄投资行为及外部均衡中的人口结构效应——来自亚洲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1): 39-50.

[8]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44-52.

[9]蔡 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 (4): 4-13.

[10]王 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 *人口研究*, 2007, (11): 76-83.

[11]蔡 昉.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 *经济学动态*, 2011, (6): 3-7.

[12]蔡 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 56-71.

[13]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5, (11): 21-27.

[14]黄少安, 孙 涛.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J]. *学术月刊*, 2013, (7): 66-76.

[15]孟令国, 王 清.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 (6): 44-53.

[16]蔡 昉.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J]. *甘肃社会科学*, 2013, (1): 1-4.

[17]齐明珠. 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J]. *人口研究*, 2013, (5): 93-101.

[18]贺大兴.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两次人口红利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3, (4): 46-52.

[19]郭 晗, 任保平.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 (8): 70-75.

[20]任保平, 郭 晗.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机制[J]. *学术研究*, 2013, (2): 69-75.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GUO Han, REN Bao-p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ges of changes i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ould show a general rule of inverted U-shaped curve, and undergo three key turning points in turn. By using growth contribution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entere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erval in the mid-1980s, crossed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2010, and will turn to demographic debt in 2030 after the continued declin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contribution rate. The 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apital formation, labor suppl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abor fo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the declin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must be transformed in such areas as the base path, the labor factor, the resource elements, the policy adjustment and other fundamental objectives.

Key words: demographic structure; demographic dividend; demographic debt; economic growth mode

责任编辑: 王俊杰